

对标同类影片，如何另辟蹊径？

电影《我，就是风！》的新突破

■文 祁海

珠影最近推出的新片《我，就是风！》，取材于广东省云浮山区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的真实事迹，主人公阿城由张家城本人饰演。该片要打响，可不容易。因为残疾人题材电影、少儿体育励志电影、真人真事电影，都不少见。珠玉在前，很难超越。令人惊喜的是，《我，就是风！》在北京、广东试映，许多观众都感到耳目一新。该片与同类影片相比，并不雷同，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突破。

大亮点一：思想观念的新高度

时代在前进，歌颂身残志坚，也要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我，就是风！》塑造的独臂男孩阿城，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阿城的“志坚”，已不满足于与身体健全人平等（如：能生活自理，自食其力），还要超越身体健全人！他打篮球不是参加残疾人运动会，而是参加身体健全人的专业比赛，用一只左手打赢别人两只手。如此惊人的雄心勇气，前所未见！更难能可贵的是，阿城的“志坚”并非只会硬拼，充满科学精神。他想打球，最初被拒之球场外，他不气馁。借助现代网络在家中小半堂也能学习打球。他终于可以进入球场，练出扬长避短的“反手抽刀”“千钧一箭”等新绝活。他斗胆参加省级少年篮球大赛，球技超群，几乎百发百中，因而火爆全网，折翼天使长出隐形翅膀！阿城超越身体健全人，不仅是球技。

该片的高潮戏与众不同：云浮队取胜的最后一球，竟不是主人公投篮。本来，球已在阿城手中，但他发现一位队友所处的位置比他更有利，他立即将球传给队友，让队友顺利进球，显示了阿城以集体荣誉为上的大局观，更为感人。阿城想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但并非志在必得，即使未能如愿也开心。原来，他不在乎头衔，最需要的是享受奋斗过程中的快感。该片很接地气，还在于首次在银幕上展现一个人走红之时，下一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这是全红婵等一些体坛小将参加奥运会夺冠之后引发的大众关注热点。阿城一夜成名，许多客商出高价请他直播带货，阿城一口拒绝：“我不在乎什么网红不网红，我就想打球，因为我喜欢它！”以上描写，显示主人公不仅球技成熟，思想也更成熟了，这就比许多体育竞技题材电影更胜一筹！

《我，就是风！》有别于常见的残疾人励志片，是描写小主人公断臂之后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肉体的痛苦，不是受欺压和家境贫困，而是人物的内心矛盾。他的主要对手是他自己，是如何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焦虑、迷茫等人性弱点，如何顶住名利诱惑，不断完善自我，放飞自我。它让人悟出：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更重要。这样的主题立意，超越了许多同类题材作品。一名山区的孩子，居然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这不是拔高，其生活原型张家城就是这样。该片为了更令人信服，还着力写好阿城的引路人，他健康成长的合理依据就更充分。

该片描写阿城的三位好老师，都有生活原型，并非虚构。一位是校长，这位乡村教师号召孩子们“走出大山”，但不是鼓励学生逃离家乡，他说的“大山”不是自然环境，是思想障碍。他引导孩子们要走出心中的大山，这是一种新理念。还有两位老师，就是阿城的父母，是儿童片中罕见的家长形象。这对石匠夫妇，顽强意志

坚如磐石，对残疾儿子，决不放弃！在孩子受歧视之时，他们敢于保护孩子。但不是只有怜爱溺爱。他们对孩子严格要求，要孩子从单手吃饭穿衣开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学习。但他们不是虎妈狼爸，也充满慈爱柔情。父亲粗中有细，连预防儿子打球滑倒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这对父母为支持孩子的正当选择，虽然家境不富裕，也从不吝啬奖励。母亲咬牙掏钱给儿子买新球鞋，儿子想骑自行车，别人怕他摔坏车子，不愿借给他。父亲便在下班后兼职攒钱，买一辆新车送给儿子，教儿子骑车，让孩子明白：只有一只手也可过得很好！当下不少人“向钱看”，阿城的父母不拿儿子当摇钱树，坚决支持儿子不搞“直播带货”，好好读书打球。父母的言传身教没有白费，有一场戏很感人：这对夫妻看到儿子的成绩，激动难抑，先笑后哭，相拥而泣，许多观众也为之落泪。

大亮点二：艺术观念的新高度

写真人真事的故事片，要避免混同于新闻专题片，必须增加艺术含量。如何增加？是一个大难题。现代电影美学有三大流派：纪实美学、影戏美学、影像美学。《我，就是风！》是纪实性电影，但不拘一格，也汲取影戏美学、影像美学之精华，就不会单调乏味。

第一招：既真实又有戏。该片的叙事方式很别致，以一名大都市白领小姐赵雅竹的成人视角去讲述山区小男孩的故事，她不是新闻记者，而是阿城的同乡，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广州动漫设计师。赵雅竹曾红极一时，后来因事业失败而一蹶不振，她为钱而投靠某大公司，奉老板密令回到久别的故乡，游说阿城“直播带货”。当她与阿城深入接触之后，大受震动，改变了人生态度，重新崛起。赵雅竹不是解说员，她自身也有完整的故事，思想性格有发展变化，虽是虚构人物但有典型意义，呼应了影片的自强主题。该片采用“少年励志+青春励志”的双线结构，打破了平铺直叙模式，在真人真事题材国产片中是首创。该片的戏剧性，还在于摒弃儿童片只写老师和家长教育小孩的传统模式，描写两代人互相促进。剧中的篮球教练高朗，人品好球艺高，但对事业和爱情的选择都不够勇敢。打篮球，他是阿城的老师。但如何做人，阿城是他的小先生。阿城父母在激励孩子的同时，也受到孩子的鼓舞，虽然人到中年也有新追求，阿城父创作了一幅巨大的石画《阿城》，阿城母为提高自己的档次，报考了歌咏班……

第二招：造型有视觉冲击力。该片在经济欠发达的云浮山区实拍，画面绝不造假，体现了真实的生活质感，但并非简单实录，也具有形式美感和张力。阿城的打球动作，通过拍摄角度、镜头运动和剪辑的精确雕刻，真实自然又漂亮潇洒。他飞速奔跑，空荡袖管在风中飘舞，大有独臂少侠之英气，使这部纪实电影也具有传奇色彩。阿城的家是实景，有点简陋，但通过照明布光的巧妙设计，画面保持了环境和陈设的朴实原貌，也很美观。该片展现南粤秀色，多是“既写实又写意”的诗化画境：浩瀚云海，绿野阡陌，碧翠竹海，清莹溪流，都格外纯净，象征小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人文环境之中，因而健康成长。该片有一个全景镜头：背景是古朴的岭南民居，屋脊的弯曲弧线如起伏波浪，前景的篮球架则像直线几何图形，一群生气勃勃的孩子在奔跑投篮，曲线美+动态美，象征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强大活力。该片有一个道具特写镜头也蕴含深意：这是阿城父创作的精美石画——用多种废弃的碎石拼接组合而成的彩色山水图，令人联想到残疾人虽残不废，乃点睛之笔！

第三招：引入神奇浪漫的动漫手法。这是该片最大胆的创新构想，剧中加插一个“竹风铃大战风神”的动漫童话故事，是阿城童年时代的启蒙宝典。竹精灵成为阿城、赵雅竹脑海中的幻象，可与真人对话。故事片引入动画片手法并不出奇，但在写真人真事的国产片中出现动漫角色，史无前例。许多纪实电影是百分之百写实，只有客观叙事，不会有主观镜头。《我，就是风！》不仅出现主观镜头，而且是高度夸张变形的动漫形象，会不会与纪实风格产生矛盾？会不会是不伦不类的生硬拼凑？该片编导研究了观众的心理，找到纪实电影可出现动漫镜头的合理依据。竹精灵的第一次出现，是校长让小阿城观看赵雅竹创作的一部描写竹精灵的动画片，是“戏中戏”，就很自然。赵雅竹是动漫创作者，阿城则是动漫爱好者，人物身份与动漫有关联。有了以上铺垫，竹精灵后来多次出现，成为二人的主观想象，就顺理成章，不显得突兀。竹精灵在全片所占的篇幅也严格把控，不会影响影片的总体风格。因此，该片在京粤试映，没有观众对其动漫镜头有异议，都认为有新意，欣然接受。

这部真人真事电影迥然植入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丰富了纪实电影的表现手段，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深化了主题，竹精灵诠释“风”蕴含的人生哲理，比真人的台词更有趣。

新食材当然可烧出佳肴。但烹饪高手用常见食材，也能设计出新的菜式。《我，就是风！》创作者勇于探索，让多种类型电影的表现手法“老树开新花”，一部影片可同时展现真、奇、美，其受众面打破了残疾人与健康人的界限以及年龄界限，行业界限和城乡界限，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共情和思考，影片的认识价值、艺术价值、观赏价值都大大提升。我们应借鉴该片的经验，拓宽中国电影的创新之路。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始于足下，终于登顶

——评电影新作《屋顶足球》

■文/左衡



在大银幕上观看新片《屋顶足球》(下称《屋》),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愉悦和会心。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云南山区女孩,以足球为梦想,以屋顶为球场,奋力拼搏寻找生命意义的故事。作为金鸡创投2021年的优选项目,它在起点处是电影大家和业内资深人士慧眼独具的发现。继而,青年编剧兼导演飞鱼(廖飞宇)把这份信任与期待,成功转化为答卷一般的处女作。影片用了三种叙述技法,分别完成对社会、艺术和文化三个层面的描画。

近年来,很多大获成功的青年影人佳作都对社会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这成为现实主义在电影领域内的新动向。许多作品中的温暖底色,更是当下主旋律拓展创新的重要标识。《屋》的故事背景,既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关,也与底层普通人、励志、爱国等主题有关。在不少作品里,不言而喻的宏大叙事,由于被过多言说,反倒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收住劲道,把思想的主题化为艺术的底色和基调,是必要而有效的策略。《屋》故事的底色,自然而然地呈现了青山绿水环抱的地域景观、质朴浓郁的民族风情、丰饶诱人的物产和生机盎然的劳作实践。有趣的是,专业化的观众马上能意识到,片中还有性别对立、个体异化、家庭离散等世界性的热点议题,却又是从中国角度的来述说的。从而,这部成本不高的影片具备了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潜能的潜在可能。

当然,首先被观众感知到并且品评的仍然是艺术语言。《屋》采用了剧情片结合体育类型的策略,导演显露出相当成熟稳健、令人欣喜的把控能力。流畅悦目的运动画面,完整清晰的结构起伏,都与大众审美趣味和习惯相吻合。云南村落的屋顶上,几个少女把袖子踢出了足球明星一般的华彩,一路踢进了与异国强队比赛的大球场,这本身就已经是很传奇的剧情了。在推进剧情的同时,又紧扣了人物心理的激荡斗争。云南少女成长中的风雨阳光、山路崎岖,被放置在不慌不忙的剧情延伸过程里,不显山不露水地在社会层面被置换成为为与乡村振兴、教育事业等相关联的叙事元素和符号表征,从而赋予了感性观赏一种理性回味的机能。如果说还有些许遗憾,大概是没能把传奇化的景观用到极致。如屋顶足球的特殊形态,还可以持续引出和屋顶下人们之间会有的矛盾,甚至催生出生决定最后胜利的巧妙法宝。年轻的电影

创作者们如能意识到,主流叙事不变的句法之内,其实有着近乎无限的修辞可能,则不但他们的创作空间会扩大,观众们的审美期待也将得到更充分而妥帖的满足。

必须承认,最打动笔者的,是与人文有关的影像质感。这种质感始终与生命原初的力与美之本源有关,它甚至不是因细节而呈现,而更像是一种无从捕捉而又无处不在的味觉嗅觉经验。那些非职业小演员不自觉、不自知的松弛状态,敞开了通向中国景观和中国人形象的一扇窗,张望过去是浑然天成的一片空灵剔透。他们的生存处境、情感体验和表露方式,每每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鲜活有味,把许多需要费力铺陈交代的剧情转折,变得如同家常生活。主人公妹妹性格张扬倔强,姐姐温厚隐忍,她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在一般的剧情片模式里,会处理得大开大阖,充满强烈的悲剧感。而在《屋》里,妹妹回到姐姐身边时,甚至没有表示歉意的台词,只通过两人的空间调度、眼神交流,和更多的沉默,就化解了西方戏剧所推崇的张力美学。云南地域那仿佛从大地里长出来木屋,用特有的光线、色彩和炊烟,轻易地包容了孩子的疲劳、伤痛和嘶吼。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一旦让渡给现代式的“天人合一”思维,人类故事的力量感并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厚重了。仔细玩味,不但这对相亲相爱的姐妹,还有若隐若现的父母、愁头愁脑的男孩子(他们对女孩们的态度和举动简直可以另成一个微妙而有趣的故事了),每个人的形象、行为和过程

都不一样,而他们的生存、命运又始终交织成一体。要是影片时长再长一些,针线再细密些,那么每一根人物的彩线都该勾勒出一条生命线吧?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部影片的受众在哪里?更确切地说,对于哪些潜在的观众来说,它能够切实成为一次寓教于乐的体验?甚至,成为那些观众们在当下童话版的《平凡的世界》、被长久记在心头?可否把它当作一份礼物,送给真正需要、喜爱它的孩子们?他们散布在三线城市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因为山河阻隔,仍然和电影所表征的现代生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在当前普及青少年影视教育的进程中,《屋》很可能是这部分观众最觉得亲近、最需要的故事。一旦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屋》的价值也就突破了电影。这部关于小小少年的影片,可以成为大思政理念的生动篇章。

飞鱼导演说,他们已经组织了近20次专为孩子们的放映,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孩子们都深深沉浸在故事里,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欢笑、落泪。因为影片足够精彩,故事足够动人,他们不会分心,不会吝惜自己的情感,也不会说违心的话语——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电影最理想也最需要的电影观众和观影氛围吗?如果今天的孩子们能多接受这样的熏陶,则我们未来将获得优质的中国电影观众群落。

始于青年影人足下的创作,终将通向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登顶之路。

从《堡垒》看传统侠义精神在革命中的升华

■文/欧阳子雨



电影《堡垒》是一部新主流影片,其巧妙地运用谍海暗战的经典桥段、浪漫主义的笔法,展现了以“韶山五杰”为代表的侠义之士,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影片中的“韶山五杰”是湖湘地区乃至近现代中国先进人士的缩影,他们义薄云天,心忧天下,保护弱小,勇于为正义奋斗。1925年韶山天旱,地主劣绅乘机囤积谷米,哄抬粮价,甚至外运牟取暴利,使得当地农民群众温饱难继,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殇。“韶山五杰”不畏艰险与恶势力斗争,夜闯地主府邸,逼其开仓放粮。“韶山五杰”身上所具备的侠义精神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再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以个人的力量和勇气,对不公平和不正义现象的坚决反抗,对他人的无私帮助,以及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支撑。

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与群众的麻木不仁让“韶山五杰”意识到,单凭一次平暴开仓是难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贫苦大众。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韶山五杰”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介绍“韶山五杰”入党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从此,“韶山五杰”由侠义之士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依靠特别支部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发动群众与地主劣绅作斗争,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韶山燎原。确实,在中国近代,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尤其是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愈发尖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单凭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品质以及个人的英勇和牺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的社会体制问题。一批批仁人志士开始对旧有的观念、方法和体制进行革新和突破,从晚清洋务派,到戊戌六君子,到辛亥革命的志士们,再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不断探索,侠义精神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升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是更多地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最后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逐渐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个过程既保留了侠义精神中的正义、勇敢和无私的品质——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的精神支柱,又赋予了它更加科学、系统和深刻的内涵,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革命实践中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指引下,“韶山五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革命理想,而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白色恐怖,毫不退缩,勇敢地执行秘密任务,与敌人斗智斗勇,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正是有了他们,“医生、学生、狂生、先生”们前赴后继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中,他们不仅具备侠士般的英勇和胆识,更有着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革命信念,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通过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精髓后,成为了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精神的重要构成元素。这种转化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精神风貌。《堡垒》通过对“韶山五杰”这段历史的合理改编,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侠义精神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完善升华的过程,对当下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也将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